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一

結構主義

高宣揚◎著

結構主義

高宣揚◎著

高宣揚◎主編
人文科學叢書

1

結構主義

高宣揚

出版・發行／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 109-115 號智群商業中心十三字樓

電話／5283671 圖文傳真／865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 30 號地庫（門市部）

電話／5283605・8650708 圖文傳真／8611541

總代理／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九龍紅磡民裕街四十一號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

電話／3031010 圖文傳真／7641310

© COSMOS BOOKS LTD. 199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九一年・香港

總序

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 *humanitas* 開始，就突出了
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
和行為。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為了人性和人的價值的
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
成為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
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為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
在西方只是從十五和十六世紀，為區別於中世紀的神
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為以人性
為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
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
化。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Léon Bruns-
chvick, 1869—1944)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
(*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一書
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
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
心之上(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 576-577 頁)。
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德·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889—1974)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
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

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 (Walter Lippmann, *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 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地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滙聚點。

這就是為什麼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 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為。」(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 394 頁) 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

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說，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一九八一年召開於法國舍弗勒(Sè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論。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西德哲學家哈伯馬斯、法國哲學家莊·弗朗斯瓦·李歐塔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和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s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一九七三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 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份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卡普勒到愛

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著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個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那末，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了。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

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為了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世界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為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德南(Hilary Putnam, 192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見其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說，米謝·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見其著作《語詞與事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末，語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Philippe Ariés之最新著作《在死亡面前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為「敍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為科學方法的「敍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

述》三卷本(*Temps et Ré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Récit*(記述)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發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énomè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天地圖書公司出版的《人文科學叢書》*，當然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吧！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初冬於巴黎

*高宣揚先生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首先由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〇年天地圖書公司與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協議合作，此後所有叢書在臺灣進行編輯工作，兩地聯合出版。

遠流天地聯合新版序

這本《結構主義》，乘著我所主編的《人文科學叢書》擴大成為香港天地圖書公司與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聯合出版事業的機會，再次與讀者見面。這本書的內容，至今未發現有大加修正的地方，這是最值得我欣慰的。從一九八二年在香港初版以後，在香港本地連續再版了三次，在台北，除了有一段時間曾授權洞察出版社合法地翻版過一次以外，有幾家出版社非法地盜印過多次。總的來講，每次再版時，總是一銷而空。李維·史陀本人在多次與筆者的談話中說，結構主義的思想同中國的傳統思想，存有許多相似之處；無怪乎，結構主義在中國讀者那裏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當李維·史陀在一九八五年出版新書《妒忌的女製陶人》(*La potiere jalouse*)的時候，對訪問他的法國作家廸廸耶·埃利本說：「論題仍然是一樣的，唯一不同的是感性的內容；或者，如果用康德意義的語詞來說，是美學的內容。」(李維·史陀與廸廸耶·埃利本對話錄《從近處和從遠處》，*Claude Lévi-Strauss et Didier Eribon, De Pres et de loin, Editions Odile Jacob, Paris 1988, p.191*)當結構主義由於「時髦」而被廣泛濫用的時候，當哲學界

和整個人文科學界，受益於結構主義却又不滿足於它而創造出新的「後結構主義」思潮的時候，作為結構主義大師的李維·史陀仍然堅持他的基本原則，並以堅韌精神，繼一九七五年發表《假面具的途徑》(*La voie des masques*, 1975/1979, Paris)之後，又在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連續發表《遙遠的眺望》(*Le regard éloigné*)、《講演錄》(*Paroles données*)和《妒忌的女製陶人》三部巨著，表現出他前後一貫的、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

一九八九年我應中華民國政府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聘請，在台北東吳大學為社會研究所講授結構主義之後，又前後三次與李維·史陀會面，向他請教研究生們提出的理論問題。多次的交流意見，使我堅信，由李維·史陀所創建的結構主義理論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如果說，在這本書再版的時候，我對本書讀者們負有未盡的責任的話，那就是將這幾年與李維·史陀本人多次在他的家中和在法蘭西學院(College de France)的社會人類學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Sociale)內的交談內容，以及我在東吳大學講解李維·史陀新著的講稿，整理成書加以出版，供大家討論指正。但願我能實踐自己的諾言。

高宣揚

1990年3月20日於

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目 錄

前言	1
第一章 結構主義的孕育過程	7
第一節 結構主義在現代語言學的最初表現	7
第二節 結構主義在現代社會學的最初表現	16
第三節 結構主義在現代心理學的最初形態	45
第四節 現代西方哲學對「結構」的探索	60
第五節 結構主義產生的社會背景	70
第二章 結構主義的基本概念	85
第一節 什麼是「結構」?	85
第二節 作為方法的結構主義	112
第三節 「模擬」	133
第四節 人類心靈的自律性	151
第三章 社會結構分析	163
第一節 親屬的基本結構	164
第二節 語言的基本結構	177
第三節 作為「結構變形」的歷史	197
第四章 結構主義的文學藝術觀	203

第一節	結構主義關於文藝的總觀點	203
第二節	神話的基本結構	208
第三節	散文小說的基本結構	223
第四節	戲劇的基本結構	232
第五節	詩歌的結構分析	236
第五章	結構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	241
第一節	李維・史陀	241
第二節	米謝・福柯	258
第三節	羅蘭・巴特	262
第四節	莊・皮亞傑	266
第五節	路易・阿圖塞	268
第六節	杰科卜生和卓姆斯基	270
第七節	雅克・拉康	272

前 言

自本世紀五十年代起，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成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接著，他的名字連同他所體系化的結構主義轟動了整個歐洲，並迅速地傳播到大西洋彼岸，在美國學術界中發生廣泛的影響。從那以後，有將近十五年的時間，結構主義成了歐美各國的時髦思潮，充斥於哲學、社會學、文學藝術、心理學、史學、法學、政治學及實際生活本身。

結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如同歐美各國所流行過的其他社會思潮一樣，它在五十年代興起、在六十年代傳播，至今還保持著對西方人文科學的廣泛影響，並非偶然；它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根源。因此，本書在介紹結構主義的基本觀念和理論體系時，不能不同讀者一起簡單地回顧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與結構主義有密切連繫的西方社會思想，特別是現代西方哲學和現代西方社會學。

結構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當然不局限於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領域。譬如說，它絕不僅僅是一種哲學觀點

和理論；同樣地，它也絕不僅僅是一種社會理論和方法，更不是單純的人類學理論和方法。因此，單純地從哲學或人類學的角度來介紹結構主義，顯然會大大縮小它所涵蓋的範圍，也會忽視它在社會文化各界的實際影響和作用。本書在介紹結構主義時，盡可能全面地敘述最一般性的觀點，也說明它在人類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特殊觀點。

但是，結構主義的靈魂和核心，在於對整個世界和整個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的總看法和總概念。這是結構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中心點。它對於人類學、文學藝術等問題的看法和影響，歸根於這一點理論體系的核心思想。而這根本性的觀念，恰好是屬於哲學的範疇。因此，本書在全面介紹結構主義的基本內容時，不能不著重在結構主義的哲學觀點上。筆者相信，在把握了結構主義的基本哲學觀點之後，它對其他思想領域的所有看法是不難理解。

結構主義的形成和體系化是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的。

早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就已經有一些語言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和分析了最常見、最普通的社會現象——人類語言和某些人類社會習俗的結構。接著，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德國社會學家弗雷爾 (Freyers) 在其著作《作為實際科學的社會學》(*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wissenschaft*) 一書中，把結構主義的部份方法應用於社會學中。

顯然，李維·史陀及其同時代的人所完成的結構主義理論體系，乃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

此，本書介紹結構主義理論的時候，也將注意到它的歷史性。所以，本書基本上是分成三大部份來論述的：

第一部份，結構主義在思想和方法上的孕育過程。在此將同時分析那些產生結構主義因素的社會歷史背景，及文化上和科學上的前提。在文化和科學前提方面，本書將著重分析結構主義產生前的西方現代社會學、心理學、哲學和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因為正是這幾方面的成果對結構主義的產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常常聽到的論調是：李維·史陀及其他結構主義者的著作很費解、很難讀；甚至有人說，結構主義者所使用的概念都是很離奇的。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在閱讀它以前，沒有下功夫鑽研與它有關的哲學、文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的著作，因而，也就掌握不住結構主義者的思想脈絡。

正因為這樣，我將在第一章裏多介紹結構主義產生以前，有關西方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哲學的思想，相信這是許多想了解結構主義的青年讀者所盼望知道的。我還相信在大致瞭解了結構主義產生前的有關思想以後，讀者就會自然地覺得結構主義概念的形成是帶有一定的必然性。

第二部份，李維·史陀使結構主義體系化的過程及其體系的基本內容。在這方面，本書將從結構主義所通用的基本概念入手，論述結構主義各種概念間的邏輯關係，然後，再以結構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李維·史陀——的

代表性著作為軸心，具體說明結構主義的理論體系。

第三部份，結構主義在現代社會中的傳播及其在各個領域的主要代表人物。本書將簡略地介紹結構主義在文學、哲學、社會學、語言學等方面的影響，以及它們在社會實際生活中的表現和作用，同時介紹各個代表人物的基本著作和基本觀點。

迄今為止，結構主義仍然保持其在哲學、文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界的重要地位。有人認為，六十年代以後，「結構主義的人」取代了「存在主義的人」。近年來，西方報刊雖然已有人慨嘆結構主義的高潮已成過去，但實際上，它的理論本身仍然不斷更新，結構主義者的隊伍也有新的分化。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國際符號學研究會第一屆大會，象徵著符號學和結構主義思潮的進一步發展。我希望，有志於研究社會思潮動向的青年們，繼續注意結構主義的各個代表人物及其理論觀點的變化。毫無疑問，這些正在活動的思潮比起過去的歷史思潮更加直接地作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生活。

李維·史陀在他的《結構人類學》(*Structural Anthropology*)的序言中說：「我們倒不如說，在人文科學（因而也包括人類學）中，任何一個假設都有一種相對的價值，即它能夠比它所取代的前一種假設更能考慮到事實。這也就是說它的價值可以一直有效到那樣一個時期——到那時，另一個新的假設在同一方向上取得了新的成果。」

由此可見，即便是結構主義的創立者也不希望人們把